



AA

Afro-Asian Studies

亚非问题
研究

3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亚非问题研究

第 3 集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亚非问题研究

第3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海淀草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40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 3209·5—1 定价: 1.20元

编 辑 说 明

《亚非问题研究》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主编的综合性学术研究论文集。从1982年开始公开出版，并向国内外发行。

《亚非问题研究》为不定期出版综合性论文集，每集刊登的研究成果和选译的外论，涉及的地区力求相对集中。每集15万字左右。本论文集主要刊登东北亚、西亚、非洲地区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现况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的资料、以及有关的外论选译，适当选登国内外有关的学术动态和重要的书刊评介等。阅读对象主要为外国问题研究人员以及外事工作人员，同时也适合各级干部、知识青年和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阅读，以扩大国际知识的视野。

《亚非问题研究》是学术性研究文集，目的在于推动对亚非地区历史和现况的调查研究 and 开展学术交流，通过学术上的讨论，推动亚非问题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亚非问题研究》第1集为日本问题专集。第2集为西亚、非洲专集。本集是第3集，为东北亚、西亚、非洲问题综合专集。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并蒙赵朴初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在此一并致谢。

《亚非问题研究》编辑部

1983年1月

目 录

中日佛教交流一千年.....	张俊彦 (1)
朝鲜高丽时期的诗人李齐贤与中国.....	杨永骧 (61)
波斯湾西南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	安维华 (69)
关于油价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陈悠久 (89)
萨达特对苏美以政策的剖析.....	刘和生 (112)
关于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的矛盾问题.....	张振国 (125)
索马里部族问题初析.....	静 一 (135)
浅论南非历史上的“穷白人”的问题.....	颜 笑 (144)
非洲早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篇章.....	王忠林 (156)
东非共同体解体的原因.....	施裕壬 (17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非洲的研究.....	夏吉生 (179)

译 文

1952—1978年埃及向外移民政策的变化

..... 阿里·伊·希莱尔·戴索基 (205)

沙特阿拉伯农业部门有了缓慢发展

.....《阿拉伯经济学家》(227)

海湾合作委员会经济协定.....《阿拉伯经济学家》(23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国十年大事记

.....《中东经济文摘》(237)



我的履历书.....〔日〕永野重雄(241)

Contents

- One Thousand Year's Buddhist Inter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Zhang Junyan (1)
- Li Qi-Xian, a Korean Poet in the Korean Dynasty
Period, and China Yang Yongliu (61)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Countries
on the South-West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 An Weihua (69)
-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Oil PriceChen Youjiu (89)
- An Analysis of Sadat's Policy Towards the U.S.
S.R., U.S.A. and Israel Liu Hesheng (112)
-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urks and Greeks in
Cyprus Zhang Zhenguo (125)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Somali
Nationalities Jing Yi (135)
-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Whites in th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Yan Fu (144)
-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History of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
vement Wang Zonglin (156)

- The Reason fo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Shi Yuren (170)
- African Studies in Americ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Xia Jisheng (179)

Translation

- The Shift in Egypt's Migration Policy, 1952—1978
 Ali E. Hillal Dessouki (205)
- Saudi Arabia, Agricultural Sector Registers Slow
 Growth 《 Arab Economist 》 (227)
-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Economic Agreement
 《 Arab Economist 》 (233)
- UAE, The First 10 Years 《 MEED 》 (237)

Monograph

- My Antecedents (Japan) Shigeo Nagano (241)

中日佛教交流一千年

——公元七至十七世纪中日僧侣往来的回顾

张俊彦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仅据史籍上有记载的交往，迄今便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在古代，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莫盛于中国的隋唐、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而这期间也正是从印度东传的佛教在中国进入全盛、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的时期。因此，细考这个时期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极饶兴味的事实——在此时期内两国僧徒之间来往的频繁；或者，毋宁说，从这时期开始的两国文化交流的高潮，高僧大德们实际上是一马当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此以降，从公元七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漫长一千年间，即亘中古之世，两国僧侣之间的往还，一直史不绝书，在两国邦交暂时中断的时期（如北宋和元代），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绝无仅有的维系者。而且在日本兵戈不息、社会动乱的南北朝、战国时代，保护了文章典籍于不坠的，正是当时仿效中国文学的“五山”禅僧，所谓“斯文一脉记传灯，四百年来付老僧”〔1〕。凡此，均足以说明僧侣们在此时期两国文化交流上的贡献。

本文即拟从交流的角度，回顾一下这一千年内两国僧侣往来的史实，略表我们对这些不畏险阻、勇涉苍波、推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的高僧大德的纪念心情。

“我法东流”和日僧西渡

相传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释迦牟尼在天竺所创立的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经西域传入中国。中国史籍上有关佛教的最早记载是后汉明帝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嘉奖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的诏书〔2〕。但是，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了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印度佛学的各教派大体上都已陆续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便日益兴盛起来。

正如中国文化最初是经过朝鲜半岛作中介而传入日本一样，在中国兴盛起来的佛教，也是经由朝鲜半岛而传到日本的。据说在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52年）冬十月，百济的明王遣西部姬氏达卒怒喇斯致契等向日本天皇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上表大赞佛法的功德说：

“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喇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说，我法东流。”〔3〕

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然而据说早在继体天皇十六年（公元522年）就有中国南朝梁朝人司马达等来到日本结草堂奉佛了。“时此方未有佛，达等于和州高市坂田原，结草堂奉佛，国人不知佛，谓之为异域神云。”〔4〕这样看来，佛教最初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日本的。说来有趣，这个司马达等家族竟同佛教在日本的最早传播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司马达等本人在敏达天皇十三年（公元584年）曾奉大臣苏我马子之命到四方寻觅修行者，他在播磨国找到一位高丽的还俗僧惠便，司马达等的11岁女

儿司马岛就跟从惠便出家，取名善信尼，成为日本的第一个女尼^[5]。后来她又是第一个到百济去学受戒法的尼僧^[6]。在公元587年用明天皇逝世时，司马达等的儿子多须奈为追荐先皇，又自请出家。多须奈的儿子鞍作鸟更是一位制造佛像的能工巧匠，他所造元兴寺铜绣丈六佛像，曾受到推古天皇的褒奖，赐以大仁位并给近江国坂田郡水田20町。鸟即以此田为天皇造金刚寺^[7]。据说现藏于日本奈良法隆寺的释迦三尊铜像，就是鞍作鸟的作品，其栩栩如生造型，至今犹为人们所称羨。可见佛法东流日本，一开始就同中国、中国到日本的“渡来人”有着很深的关系。

六世纪末，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联合，在粉碎了反对佛教的物部氏贵族的抵抗之后，于公元593年拥立其本族的皇女为推古天皇，而由圣德太子充任摄政，从此就开始了苏我马子和圣德太子两人的几乎长达30年的专政。他们两人都崇敬佛法，圣德太子还亲自拜从高丽来的归化僧人惠慈为师，相传他曾著《法华经义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统称《三经义疏》。从这些义疏中，就可窥见其与中国佛教的渊源。如《法华经义疏》就是根据梁朝的光宅寺僧人、著名的“成论大乘师”法云（公元467—530年）的《法华义记》增删而成。

圣德太子所颁布的宪法17条中，第二条就说：“笃敬三宝。三宝者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8]在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倡导下，朝廷曾耗用大量国帑来兴建壮丽一时的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等大型寺院，因此，佛教在日本便逐渐隆盛起来。据统计，到苏我马子逝世的公元626年，日本全国已有寺院46座，僧816人，尼569人，合计1,385人^[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圣德太子派使节率领留学僧到中国隋朝的壮举。

隋朝的时候也正是中国佛教重新复兴的时期。

原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在公元577年曾经遭受过一次挫折，这就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厄运之一的北周武

帝的灭佛事件^[10]。当时武帝在邺都召集僧徒500人宣布废佛，捣毁了周齐境内（时北周已兼并了北齐）的佛像，焚烧了经卷，把4万所以上的寺庙没收，赐作王公宅第，有近300万人的僧侣被迫令还俗。

但是这次灭佛的举动历时甚短，公元579年武帝一死，宣帝登位后便取消了禁令。杨坚在公元581年建立隋朝后，更进一步大弘佛法。隋文帝认为，弘扬佛教可使“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倡，从闇入明。”^[11]在其给天台宗创立人智顗的诏书中更明白地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12]因此，总计有隋一代的40多年间（公元581—618年），新造寺院达3,900余所，重新度僧236,000余人，写经和补写旧经658藏，造像11万躯。^[13]

佛教在中国复兴的情况，可能通过朝鲜半岛，而使日本早有闻知。因此，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到隋朝的使节，即与求佛法有关。这次派使的情况，虽然在日本史籍上毫无记载，而《隋书》、《北史》也未谈到派使与求法的关系，但从北宋初年来华日僧裔然所上《王年代纪》中，却可窥见此中消息。裔然说：“当此土隋开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14]当即指这次派使。本居宣长在《馭戎慨言》中疑这次并非日本朝廷派使，乃“西边之人所为”，恐怕是不足为据的。接着，圣德太子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派遣大礼小野妹子和通事鞍作福利等来隋朝通好，更明白地与寻求佛法有关（当然同时也还有学习中国的文物典章的用意）。《隋书》所记使者的话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15]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随同小野妹子来华学佛法的“沙门数十人”，无论中、日两国的史籍上，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但根据当时来华留学僧一般逗留时间都在二、三十年以上的通例，在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公元623年）回国的僧惠光、在舒明天

皇四年（公元632年）回国的僧灵云和胜鸟养、在舒明天皇十一年（公元639年）回国的僧惠云等很可能即属于这批来隋的沙门也未可知。

从此就开始了隋唐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热潮，在两国的史籍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僧侣往来的记载，公元608年小野妹子奉命伴送隋使裴世清回国而再度来华时，携带了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等4个留学生，新汉人旻、南渊汉人清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等4个留学僧同来^{〔16〕}。他们在中国留学的时间，据可考知其年代的来看，少则10余年，多的甚至达30多年。^{〔17〕}可见其学习的深入。关于留学生回国后的贡献，这里暂且不表，仅就学问僧而言，他们在学成归国之后，不仅在弘扬佛法上发挥了作用，如学问僧志贺汉人惠隐在回国的翌年，即舒明天皇十二年（公元640年）五月的大斋会上就曾荣奉敕命宣讲《无量寿经》，僧旻是大化元年（公元645年）所推举的十师之一，所谓十师就是供奉天皇的供奉僧，这里还要顺便指出，大化所置十师除僧旻外，其他如福亮、慧云、常安、灵云、道登、慧邻、慧妙等都是曾到中国留学的学问僧，其中的僧旻、福亮还是归化的汉人；而且这些学问僧在移植中国的文物典章、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在皇极天皇四年（公元645年）发动“大化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就都曾就学于南渊清安在回国后所开办的学塾，僧旻更直接参预政治，在“大化革新”时被任为两个国博士（政治顾问）之一（另一人为留学生高向玄理）。

由于僧侣直接参预政治，所以“大化革新”不仅使日本的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也使日本的佛教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大化元年在百济大寺召集僧尼，孝德天皇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一时修建寺庙成为风尚，到了七世纪末全国的寺院就激增到540余所^{〔18〕}。而这时也正值中国唐代的佛教全盛时期。

唐代佛教的盛况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到了唐代便达到一个全盛的时代。在这时期，具有本宗特别崇奉的经典、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以及标榜不同的传法世系的各种宗派，相继兴起，最后出现了已经完全中国化的禅宗，使中国佛教教坛一时呈现百花竞艳的灿烂局面。

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从思想上来说，自魏晋以来，经过数百年的酝酿，一方面通过大量的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天竺僧人的东来传道等，使人们对于印度佛教的面貌，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逐渐改变了所谓涅槃师、成实师、毘昙师那种只熟悉某种或某类经典的状况；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又是在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学说的相互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理论上的交锋，特别是与魏晋玄学的大辩论，必然导致彼此相互之间的交融和吸收，这就使佛教理论进一步得到丰富，开始具有不同于天竺的中国自己的特点。

从经济条件来说，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寺院经济，到了隋唐时代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寺院一般都拥有大量的资产，这是因为它们一有朝廷的敕赐，在唐代，凡属“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19〕；二有官僚豪富向寺院的捐献，这些人甚至径直以自己的产业设置兰若（寺庙），史载，唐代自“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20〕；三有僧侣交通官绅权贵的巧取豪夺，如被太平公主举为圣善寺主的胡僧慧范，“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21〕，其家产达“数十万贯”〔22〕。此外，不少寺院还放高利贷，美其名曰“长生库”、“无尽藏”，月利竟有高达20%的。因此，寺院庄园，阡陌相连，盛极一时。如隋僧慧胄所主持的清禅寺，“水陆庄田，仓

廩彙，庫藏盈滿”，“京師殷有，無過此寺”〔23〕。又如圓仁入唐時在山東看到的寺院，竟有“莊園十五所”之多〔24〕。這些在當時享有免征徭役賦稅特權的寺院經濟，就為各種不同宗派的興起，提供了物質基礎。

再從歷史背景來看，在南北朝時代，由於政治局面的不統一，佛教的發展，也就南北各異。正如玄奘早年所慨嘆的：“大乘不二之宗，析為南北二道”〔25〕。大體上說來，當時南方佛學偏重於玄談，北方佛學則偏重於實踐，因此，義學在南方比較發達，而禪法則在北方廣為流行。隨著隋唐相繼建立了統一的大帝國，南北之間的藩籬破除了，當初只流行一地一隅的學說，便產生了要以本宗來統一佛教各派、建立囊括全局的完整的佛教理論體系來執牛耳的要求。

正是由於有了上述這些條件，於是從天台宗起，便提出了“判教”的學說，其目的就是要從天竺傳來的佛教各派系，說成是一個有机的整體，力圖給以分析和解釋，以構成一個包羅一切的龐大而複雜的體系，而以本宗的教義冠於群宗之首，從而確立本宗統率群宗的領袖地位。因此，這個時期先後涌現了各放異采的各宗學說，蔚為唐代佛教教壇上的奇觀。它們在學說上都獨樹一幟，實破了前代的經師、論師們墨守一經的局限，而具有本宗學說的獨創性；在組織上也是自成系統，各立門戶，有著嚴密的傳承世系，有的還以中國的地名、寺名和宗師的名字作為宗名，表現了其組織上的獨立性。

這時先後出現的佛教各宗主要有：天台宗，這一派形成的中心地點在浙江的天台山，因而得名，又因它以《法華經》為本宗特別崇奉的經典，故又名法華宗；三論宗，這是根據在公元五世紀初由鳩摩羅什譯傳中國的印度高僧龍樹所著《百論》《中論》、《十二門論》及弟子提婆《百論》來說法的一宗，故稱三論宗；律宗，凡屬僧侶都須修持戒律，天竺的《十誦律》、《四分律》、《僧祇律》早在南北朝時已譯傳中國。唐代高僧道

宣（公元？——667年）平生持律坚定，着重提倡《四分律》，投门弟子多至千数百人，律学因而成为专门学问，号为律宗，又因道宣居终南山，他这一派又称南山宗；慈恩宗，因宗祖玄奘（公元600—664年）从天竺求法回国后，就住在长安慈恩寺弘法，因而得名，本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旨归，故又名法相唯识宗，简称法相宗或唯识宗；华严宗，以宗奉《华严经》而得名，由于它依据《华严经》宣扬法界缘起论，所以又称法界宗，又由于本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公元643—712年）被武则天赐名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密宗，本宗师徒传法要举行秘密仪式，授以真言，故又名真言宗；禅宗，这是由梵语包括了定、慧两方面修行方法的“禅那”（Dhyana）一语借用而来的、完全中国化了的一个佛教宗派；净土宗，这是宣扬只要念佛或修功德，就可脱离轮回，往生乐土（净土）的一个宗派。

这些宗派在这时期都先后传到了日本。

中国佛教各宗的东传日本

在唐代，由于日本派遣了大批的学问僧、请益僧到中国来学习，同时还有一些中国高僧东渡日本弘法，所以这时期的佛教各宗基本上都先后传到了日本。不过其中有些宗派（如禅宗、净土宗）在日本的广泛流行，则是到了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宋代的事。^{〔26〕}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各宗东传日本的先后次序，并非等同于其在中国形成宗派的先后次序。如在中国最先成立的佛学宗派是天台宗，而在日本最早以一个宗派面目出现的却是三论宗。这是因为在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公元625年）来到日本的高丽僧人慧灌，乃是中国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公元549—623年）的门下高足，他到日本时适逢大旱，因他讲“三论”求雨有验而大受崇敬，被任命为日本的第二僧正（第一僧正为在他之前任命的百济僧观勒），成了日本三论宗的始祖。值得注意的是，大化元年所

任命的十师，大多是慧灌的门徒，慧灌还曾奉旨在中宣讲“三论，”可见当时三论宗在日本势力之盛。

日本三论宗的第二传智藏，是慧灌的弟子，他在天智朝（公元662—671年）曾入唐求法，其父福亮是归化日本的汉人，也是慧灌的弟子，父子二人都曾被任命为僧正。

日本三论宗的第三传道慈（公元？—744年），出于智藏门下，他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入唐亲自向吉藏的法孙、对“三论”都作了注疏的元康学三论宗，于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公元718年）回国。道慈的名气很大，在唐求法时就被选入唐朝皇宫讲《仁王》、《般若》两经，受到赞赏。回国后，他与当时留学新罗的神睿被并称为“释门秀者”。元正天皇在养老三年（公元719年）赐二人食封各50户，天皇的诏书嘉奖道慈说：“道慈法师，远涉苍波，覈异闻于绝境；退游赤县，研妙机于秘记。参迹象龙，旅莫秦汉。并以戒珠如怀满月，慧水若泻沧滨。儒使天下桑门智行如此者，岂不殖善根之福田，渡苦海之宝筏？朕每嘉欢不能已也。宜施食封各五十户，并标扬优赏，用彰有德”〔27〕。而当圣武天皇天平元年（公元729年）在平城京迁建大安寺时，就是由道慈仿照长安西明寺的样式设计建造的，“所有匠工莫不叹服焉”〔28〕。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在日本“当时的宗派决不是如同后代那样壁垒森严，不仅一寺不单布一宗，就是一人不兼二宗、三宗的也很少。”〔29〕这是与中国不同的一个特点。如道慈虽说是三论宗的第三传，但据说他一人就传入了三论、法相、律、成实、华严、真言等六宗。

虽说道慈传过法相宗，但是一般认为道昭（公元629—700年）是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传。他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公元653年）随遣唐大使吉士长丹舶来华，就在长安直接从玄奘学法相宗，并旁学禅宗。他留唐7年后回国，即在元兴寺弘扬法相宗。在齐明天皇四年（公元658年）乘新罗船入唐的智通、智达，也是在长安直接从玄奘学法相宗，他们是日本法相宗的第二传。